

官話語音的地域層次及其歷史因素

侍建國*

本文首先對官話方言裏文白讀音的性質和漢語官話早期形態提出看法，作為討論的依據。第二節討論宕江攝入聲韻尾的音變。在現代北京話（白讀音層次）裏，原來的塞音尾變成[-u]韻尾。在現代中原官話和南方官話裏，宕江攝入聲字則變成零韻尾。這是由於不同的官話區裏發生了不同的音變。第三節討論曾梗攝德、陌、麥三韻入聲韻尾及元音的音變。在現代北京話和中原官話裏，原來的塞音尾變成[-i]韻尾，在南方官話裏則變成零韻尾。此外，德、陌、麥三韻的韻核元音，在北方官話和中原官話的變化也不同。在中原官話裏，德、陌、麥三韻的元音合併，例如，德韻的「得」和麥韻的「麥」在洛陽、鄭州、山東大部分地區以及江蘇贛榆等方言裏有相同的韻核元音。而在北方官話裏，德韻和陌麥韻字的元音有不同的音變，所以，「得」和「麥」在現代北京話（白讀音層次）以及東北官話裏，韻核元音舌位高低不同。根據宕江曾梗四攝入聲字在不同官話區的不同音變，第四節討論「詞彙擴散」理論（Wang & Lien 1993）與「方言混合」假說對於這些現象所能提供的解釋。筆者認為：一，在官話區內，由於方言間的頻繁接觸，方言混合常常是多層次的；二，如果「詞彙擴散」論已經接受「方言混合」的說法，就沒有必要再爭論官話方言裏入聲字讀音不規則現象，它們到底是方言影響的結果，還是詞彙擴散的殘餘。重要的是釐清這些外來音的來龍去脈。

關鍵詞：官話語音 歷史音變 北方官話 中原官話 南方官話

*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1. 文白讀音層次及三種官話早期形態

1.1. 北京話文白讀音的性質

文白讀音的性質，在漢語非官話方言裏比較清楚，即文讀是外地音，白讀是本地音 (Norman 1988: 41, Chan 1983)。但是，很少有人說官話方言的文白讀音也這樣。徐通鏘先生 (1991: 349) 提出官話的白讀音與文讀音代表兩種不同的語音體系，前者代表本地音，後者代表以本地方言音系「所許可的範圍吸收某一標準語（現代的或古代的）的成分，從而在語音上向這一標準語靠攏」。李榮先生 (1982: 115) 對文白異讀的看法大致與此相同，但對北京話的文白異讀卻有相反的意見，他認為「北京的文白異讀，文言音往往是本地音，白話音往往是從外地借來的」。李榮先生是在討論方言借字時說這段話的。他舉了兩個借字的例子，一個是「搞」，一個是「尷尬」。按北京話的古今音變規律，「搞」字應念成「攪」，「尷尬」應念成「監介」。它們現在的讀音是外來的，不符合北京話的音變規律。前者從西南官話借來，後者從吳語借來。李先生所說的北京話裏「白話音往往是從外地借來的」，大概指「搞」「尷尬」這一類不合北京話音變規律的方言借字。那麼，他所說的「搞」「尷尬」這一類音就不同於本文所說的文白異讀的「白讀音」。看表一的文白異讀例字（白讀音來自陸志韋1956年《北京話單音詞詞彙》）。

	白 讀	文 讀
雀	tɕ'iau	tɕ'üə
約	iau	üə
落	lau	luə
殼	tɕ'iau	k'ə
學	ɕiau	ɕüə
塞	sei/sai	sə
色	ɕai	sə
擇	tɕai	tsə

表一 北京話文白異讀例字

顯然，李榮先生關於北京話裏文言音往往是本地音，白話音往往是外地音的說法，不是針對表一所代表的文白兩讀現象。表一所顯示的來自古宕江曾梗四攝入聲字的現代韻尾，其文、白讀音有明顯的規律。白讀音裏來自古宕江攝入聲字的「雀」「約」「落」「殼」「學」，今音收[-u]韻尾；來自古曾梗攝（德陌麥三韻）入聲字的「塞」「色」「澤」，今音收[-i]韻尾。二者的文讀音則統統收零韻尾。如此整齊的對應，不能不引起注意。

如果再將視點擴大到北京話以外的官話方言，如表二裏宕江曾梗四攝入聲字在東北官話、中原官話、江淮官話的讀音（它們都應屬於白讀音層次），¹ 我們看到更為整齊劃一的現象。

		東北官話	中原官話	江淮官話	北京話
宕攝	雀	tɕ'iau	ts'üo	tɕ'iaʔ	tɕ'iau/tɕ'üə
	約	iau	üo	iaʔ	iau/üə
	略	liau	lüo	liaʔ	lüə
江攝	覺	tɕiau	tɕüo	tɕiaʔ	tɕiau/tɕüə
	學	ɕiau	ɕüo	ɕiaʔ	ɕiau/ɕüə
	樂（音樂）	iau	üo	iaʔ	iau/üə
曾攝	則	tsai	tse	tsəʔ	tsə
	或	xui	xuei	xɔʔ	xuə
梗攝	擇	tsai	tɕe	tsəʔ	tɕai/tsə
	責	tsai	tɕe	tsəʔ	tsə
	獲	xuai	xuei	xɔʔ	xuə

表二 宕江曾梗（德陌麥三韻）四攝入聲字在東北、中原、江淮官話及北京話的讀音

¹ 東北官話的例字來自「東北方音和普通話讀音常用字對照表」，見藤吉海、張發明《語音文字基本功訓練手冊》，吉林大學出版社，1990年。中原官話依開封話讀音，材料來自高本漢（1948）。江淮官話依揚州話，材料來自《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江蘇人民出版社，1960年。爲了對比的便利，本文用[ü]代替原材料裏的[y]。

1.2. 東北官話、中原官話、江淮官話

先比較表二的東北官話與北京話。古宕江攝、曾梗攝入聲字今音在東北官話裏分別以[-u]和[-i]收尾，這與北京話的白讀形式完全相同。林燾先生（1987）比較了北京話與東北官話的調值後認為，北京話與東北官話應屬於一個官話區，這個區內「不但聲韻系統基本相同，調類相同，而且調值全同或極近似，這在漢語方言中是絕無僅有的。」北京語音歷史上曾受東北官話的影響，最近的跟明末清初滿人駐北京有關。進京的滿人，其中很多是漢族血統的滿人和東北的漢化滿人（俞敏 1986）。

再比較表二的北京話與中原官話和江淮官話。北京話的白讀音與中原官話似不相關。例如，古宕江攝入聲字今音在中原官話裏收零韻尾，而北京話收[-u]韻尾。古曾梗攝入聲字今音在中原官話也有收[-i]尾的，但與東北官話比起來，其對應性（包括韻核元音）不如東北官話。但是，北京話古宕江攝入聲字今文讀音似與中原官話有關，例如，開封話的[üo]對應於北京話的[üə]。

奇怪的是，北京話古曾梗攝（德、陌、麥三韻）入聲字今文讀音似乎與江淮官話的關係更密切，這可以從下列三方面說明。一，據《方言》季刊近幾年的報導，德、陌、麥三韻入聲字在中原官話區內（包括山東省），不少地方今音念[-i]韻尾，如河南靈寶、盧氏（賀巍 1985）、山東莒縣（石明遠 1987）及嶗山、諸城、濟南、曲阜（錢曾怡等 1985）、荷澤、聊城（董紹克 1986）。（那些不帶[-i]韻尾的形式應是後來音變所造成的，3.1節將討論這個音變）。二，江淮官話的今入聲字雖帶有一個喉塞音[-ʔ]，但作為一個韻尾的輔音，聽覺上其輔音性比不上聲母的輔音。可以相信，江淮官話入聲字以喉塞音收尾的音變，不晚於明末清初（清人胡垣（1810-1880）的《古今中外音韻通例》裏記錄了南京話p, t, k韻尾合併成一個喉塞音韻尾。見鮑明燾 1986）。當這些以喉塞音收尾的入聲字的讀音借入北京話時，由於那時北京話已不再有短促的入聲音節，從江淮官話來的喉塞音也就當然被北京人省略成零韻尾了。如南京話的「色」[səʔ]，在北京人聽來是[sə]。三，北京話裏一些古知莊組聲母的字如「色」「擇」，其聲母的文讀形式，也能在江淮官話裏找到對應。「色」「擇」北京話今音口語音念捲舌，文讀音卻變成了非捲舌音。在南京話裏，這些字都不捲舌。²

² 周世箴（1989）認為，非捲舌音變曾發生在《洪武正韻》以前的金陵官話裏，那些原知、莊組字失去捲舌特徵。

以上分析顯示，北京話內部的文白讀音差異源於不同的語音體系。概括的說，白讀音層次屬本地音，文讀音層次是外地音。這些外地音來源於歷史上中原官話和江淮官話對北京話的影響。

1.3. 早期官話的三種形態

雖然對漢語官話早期形態的確切形式尚無定論，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把等韻圖所代表的音系看作漢語官話的雛形。³ 這不僅僅是等韻音系處於從《切韻》到《中原音韻》的一個過渡階段，更重要的是等韻圖代表了中國學者開始對語音的系統分析（董同龢 1968：112）。薛鳳生先生（1987）甚至提出了古代學者的等韻圖對韻母的排列，在原理上暗合了現代語言學的辨音特徵理論（distinctive features）。

再從《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等後期韻圖的入聲字兼配陽聲韻、陰聲韻的現象看，古入聲字在這些韻圖所反映的方言裏已經發生變化。入聲韻與陰聲韻相配，表示入聲字塞音尾在當地口語裏已經起了變化。但在標準讀書音裏，入聲韻尾依然保存，所以能配陽聲韻。這反映了本地音（口語音）與外來音（讀書音）的對立。至於陰聲韻裏一組入聲字甚至三配（既配收噫韻、收鳴韻，又配零韻尾）的情況（見周世箴 1986），這些一字三讀的現象，有些可能是作者「遵古」的做法，爲了「四聲相配」，勉強爲陰聲韻找出相配的入聲字。有些可能既記錄了本地口語音，也記錄了本地讀書音，還記錄了外地音。例如，代表元代大都地區語音的《中原音韻》，據薛鳳生先生（1975：103-5, 1990：123-6）的研究，有些入聲字也有本地音和外地音的區別。韻圖、韻書裏入聲字兩讀的現象說明，官話較早期的形式，存在本地音和外地音的差別。某音對甲方言來說是本地音，對乙方言來說就是外地音。以此推測，早期官話應該有不同的系統，入聲字韻尾的不同是它們的主要特徵之一。參考現代官話方言的不同讀音，以及唐宋以後開封、金陵和北京地區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早期官話可分爲三種形態，即早期中原官話（以汴洛地區爲中心），早期北方官話（以幽燕地區爲中心）和早期南方官話（以金陵地區爲中心）。

根據宋代汴洛地區文人的用韻，周祖謨先生（1943）所研究的宋代汴洛方音，可作爲早期中原官話的代表音系。最系統的表現早期北方官話的是《中原

³ 見Pulleyblank (1984: 3, 61)，薛鳳生（1987, 1985），Norman (1988: 29)。

音韻》，它忠實的記錄當時大都地區的口語音（薛鳳生 1990：121）。早期南方官話則可以《洪武正韻》所反映的金陵音爲代表（周世箴 1989）。

2. 宕江攝入聲字的演變

2.1. 宕江曾梗四攝的早期語音形式

在討論宕江攝、曾梗攝入聲字（主要是韻尾）在官話方言裏的音變之前，這四攝的早期音系形式應有交代。對等韻音系的擬測，有幾篇影響較大的論著：橋本萬太郎先生（Hashimoto 1978-1979）根據中古漢語音系結構，認爲與聲母「明」「泥」「日」「疑」相對，中古漢語韻尾當有四個鼻音音位。他提出梗攝的部分韻類收舌面韻尾-ɲ，與之相應的入聲韻尾是-c。蒲立本先生（Pulleyblank 1984）依據現代福州方言，爲江攝構擬韻尾音叢-wŋ和-wk，爲梗攝構擬韻尾音叢-ɲŋ和-jk。薛鳳生先生（1985）對等韻音系也做出整齊的音位描寫。此外，李榮的《切韻音系》（1956）和邵榮芬的《切韻研究》（1982）也都涉及等韻圖。本文在說明宕江曾梗四攝韻部的早期形態時，採用薛鳳生先生的構擬，因爲他嚴格的音位描寫與傳統的音節結構觀點更爲契合。根據他的描寫，宕攝的韻基（韻核+韻尾）爲後元音ɔ加上韻尾-ŋ或-k，江攝的韻基爲央元音a加上韻尾-ŋ或-k；曾攝韻核爲ɔ，梗攝二、三等的韻核爲a，曾梗兩攝的韻尾爲-ɲ或-ĕ。⁴

2.2. 宕江攝入聲尾在北方官話的演變

在入聲塞韻尾消失過程中，北方官話（也可稱東北官話，包括北京話在內）的宕江攝入聲尾由-k變成-w，如「郝」、「鶴」[xau]、「削」[ɕiau]、「若」、「弱」、「岳」[iau]（讀音來自「東北方音和普通話讀音常用字對照表」，見注1）以及表二中的有關例字。這個音變可以表示爲公式(1)。

音變公式(1) $k > w / V __$ （元音V後面的k變成w）

⁴ 橋本萬太郎和薛鳳生對曾梗攝韻尾的構擬，中國學者中頗有人反對。爭論的實質是由音節的哪個成分來表現差異，韻腹元音，還是韻尾？結果或者是增加元音的數量，或者是增加新韻尾。

從表二看出，公式(1)所代表的音變沒在中原官話和江淮官話裏發生，它只發生在北方官話裏。在中原官話裏，-k韻尾隨入聲的消失而消失。表三列舉了古宕江攝入聲字在河南遂平（丁聲樹 1989）、洛陽（賀巍 1993）以及山東莒縣（石明遠 1987）、江蘇贛榆（劉斌 1990）等地的今讀。

	河南遂平	河南洛陽	山東莒縣	江蘇贛榆
角	tɕyo	tɕiə	tɕia	ɕyə
腳	tɕyo	tɕiə	tɕye	ɕyə
雀	tɕ'yo	ts'iə	ts'ye	ts'uə
學	ɕyo	ɕiə	ɕye	ɕyə
岳	yo	iə	ye	yə
藥	yo	iə	**	yə

（*號表示原有材料未列此字）

表三 中原官話區原宕江攝入聲字韻母今讀例字

河北省西南部的阜平、趙縣、藁城、無極、新樂等幾個縣市，也有古宕江攝入聲字今音念零韻尾的（見河北 1961）。因材料缺乏，不列。

2.3. 宕江攝零韻尾對北方官話的影響

音變公式(1)告訴我們，北方官話的宕江攝入聲尾由-k變成-w，宕江攝入聲字零韻尾的形式應該是外來音。從表二推測，北方官話宕江攝的零韻尾形式來自中原官話。那麼，中原官話的宕江攝入聲字零韻尾的形式何時影響北方官話？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告訴我們，影響的時間肯定早於14世紀。在《中原音韻》裏，宕江攝入聲字有的出現在以-w收尾的蕭豪韻，有的出現在零韻尾的歌戈韻。在歌戈韻裏的原宕江攝入聲字，都能在蕭豪韻裏找到它們的又讀音；但在蕭豪韻裏的原宕江攝入聲字，並不都能在歌戈韻裏找到它們的又讀音。就是說，原宕江攝入聲字變成-w韻尾是常例，變成零韻尾不是常例。根據這一點，把《中原音韻》的本質定為「口語音」是有道理的。至於那些收錄在歌戈韻裏的非常例，則是被「口語音」認可並接受的讀書音（見薛鳳生 1990: 132）。

邵雍《皇極經世書》中的「聲音唱和圖」提供了比《中原音韻》更早的關於北方官話的資料。我根據邵雍「聲音唱和圖」的排列結構以及邵康節與洛陽陳簡齋不同的用韻習慣，參照現代官話方音，認為邵康節「聲音唱和圖」反映的

應是幽燕地區的北方官話，而不是汴洛地區的中原官話（侍建國 1994b）。其中一條重要證據是，邵氏將通江宕三攝入聲字與效攝、流攝排列一起，而效、流兩攝是收-w音的韻攝，此證通江宕攝入聲字在邵康節方言裏收-w音。這正是音變公式(1)所代表的北方官話的語音變化，而中原官話的宕江入聲字失落塞音尾。

宕江攝入聲字在邵雍「聲音唱和圖」的音韻地位告訴我們兩方面的信息：一是北方官話裏宕江攝入聲字的-k韻尾，早在宋代就已經變成-w韻尾了；一是宋代中原官話裏的宕江入聲字零韻尾（或帶喉塞音）形式，還未影響到北方官話。即使個別字音已有改變，但幽燕地區通行的讀音仍是-w韻尾。邵雍可以對這些有改變的少數形式置之不理。從周德清和邵雍對宕江攝入聲字的不同安排看出，中原官話宕江攝零韻尾影響北方官話的時間，不晚於《中原音韻》時代，但不會早於宋代。

3. 曾梗攝德、陌、麥三韻入聲字的演變⁵

3.1. 德、陌、麥三韻韻尾在中原官話的音變

現代開封方言裏，原曾梗攝德、陌、麥三韻入聲字大多數是零韻尾，少數帶[-i]尾。帶[-i]尾的除了表二列出的兩個合口字「或」和「獲」以外，還有德韻的「北」「墨」「賊」「塞」（「邊塞」）和陌麥韻的「核」（「核心」）（見張啓煥等 1993）。現代開封話德、陌麥兩類入聲字的[-i]韻尾形式，究竟是受外地音的影響？還是本地音的殘留？比較這些字在西北地區的官話讀音與中原地區的晉語讀音，能得到一些啟發。

高本漢提供的河南、山西、甘肅、陝西四省十二個地點的字音材料顯示，甘陝兩省境內的蘭州、平涼、西安、三水等四處，德、陌麥兩類入聲字均帶[-i]韻尾，而山西境內的歸化、大同、太原、興縣、太谷、文水、鳳台以及河南的懷慶等八處，德、陌麥兩類入聲字均為零韻尾（見高本漢 1948：710-20）。蘭州、平涼、西安、三水等四處方言屬官話方言區，而大同、太原、懷慶等八處方言屬晉語區，其主要特徵是有入聲（見侯精一 1986）。不難看出，德、陌、麥三韻是零韻尾還是[-i]韻尾，也成了晉語與其毗鄰的西北部蘭銀官話的區別之一。

⁵ 本節的部分觀點又見《方言》1996.3。

再比較表四裏河南境內幾處官話方言的讀音（洛陽話根據賀巍 1993，遂平話根據丁聲樹 1989，其餘的根據張啓煥等 1993）。

	洛陽	鄭州	商丘	遂平	信陽
北	pei	pei	pei	pei	pɛ
得	tæ	tɛ	tei	tæɛ	tɛ
勒	læ	lɛ	lei	læɛ	lɛ
賊	tsei	tsei	tsei	tsei	tsei
國	kuei	kuɛ	kuei	kuæɛ	kuɛ
白	pæ	pɛ	pei	pæɛ	pɛ
麥	mæ	mɛ	mei	mæɛ	mɛ
擇	tsæ	tɛ	tsei	tsæɛ	tɛ
額	æ	ɣɛ	ɣei	æɛ	ɣɛ
或	xuæ	xuai	xuae	xuæɛ	fɛ

表四 河南洛陽等地德、陌麥字韻尾比較

遂平方言[-ɛ]尾的音系地位值得討論。根據丁聲樹先生的描寫，元音[ɛ]出現在兩種環境：一是作為元音a的變體，出現於齊齒呼與撮口呼音節；二是出現在元音[æ]之後，但[æ]不能單獨為韻，如「蓋」[kæɛ]、「介」[tɕiæɛ]、「怪」[kuæɛ]。[æ]後面的[ɛ]可分析為韻尾，理由有三。第一，遂平方言裏，韻尾的[ɛ]與韻尾[-i]在兒化音節裏受同一條音變規則制約，即音節-r化後，尾音[i]或[ɛ]都脫落，同時韻腹元音央化（見丁聲樹 1989）。例如下列字的讀音。

背 pei > pər
 味 uei > uər
 嘴 tɕuei > tɕuər
 蓋 kæɛ > kər
 牌 p'æɛ > p'ər

把[ɛ]分析為韻尾的第二條理由是，遂平話裏以[æɛ]為韻基的舒聲字都來自中古蟹攝字。這類字在開封、洛陽、鄭州、信陽等其他河南方言裏，都被描寫為帶[-i]韻尾。第三，官話的韻尾在實際發音過程中，只表示舌位移動的方向。丁先生的記音[ɛ]，表示舌位由[æ]到[ɛ]的輕微移動，[ɛ]所代表的向上移動的方向，其音系地位應與韻尾的[i]相同。

商丘話大都帶[-i]韻尾。表三裏「或」字以[-e]收尾，類似的還有「塞」「核」。作為收尾的[-e]，它只出現在[æ]韻母。商丘話有[ei]和[ao]韻母，但沒有

[ai]韻母。來自中古舒聲的[ei]、[ao]韻母的字，分別對應於北京話的[ei]、[ao]韻母的字。而來自中古舒聲的[ae]韻母的字，則對應於北京話的[ai]韻母的字，它們也對應於其他河南方言如開封、洛陽、鄭州、信陽的[-i]韻尾的字。所以，商丘話[-e]尾的性質應與遂平話[ɛ]尾性質相同。

跟晉語、蘭銀官話的比較，再加上遂平、商丘的例子，可以假定，在早期的河南中原官話裏，德、陌麥韻的字有[-i]韻尾，後來有些方言裏這個[-i]韻尾消失了。商丘、遂平今音都帶韻尾；而洛陽、鄭州、信陽多數是零韻尾，少數帶[-i]韻尾，找不出分化規律。德、陌麥韻的字在開封、洛陽、鄭州等方言裏今音讀零韻尾和[-i]韻尾混合的現象，應是「詞彙擴散」的結果。

在表四諸方言裏（包括開封方言），保持中原官話早期帶韻尾形式的只有商丘、遂平方言，其餘的大多失落韻尾。再把考察範圍擴大到河南省西南部的二十六個縣市（見表四）。據報導，靈寶、盧氏兩縣屬德、陌麥韻字保持韻尾的方言，讀[ei]韻，其餘二十四個縣市都失落韻尾（見賀巍 1985）。比較韻尾的有無，我們發現這樣一種現象，在德、陌麥韻韻尾失落的方言裏，都保存了少數帶韻尾的字，這些字集中在「北墨賊國或獲塞核」這八個字。反過來，在保持韻尾的方言裏，德、陌麥韻字今讀零韻尾形式極少。商丘方言沒有，遂平方言裏只有四個字「刻客黑嚇」，它們都不帶普遍性。

以上現象說明，在河南的中原官話裏，德、陌麥韻字今音帶韻尾的形式，其普遍性大於零韻尾形式。這種普遍性不在於哪種形式為常見形式，而在於哪個更具規律性。今音帶韻尾的形式出現在所有河南的中原官話方言，而零韻尾形式無此現象。此外，那些普遍出現的帶韻尾的讀音，是幾個固定的字，而零韻尾形式卻無此規律。

綜上所述，德、陌麥韻入聲字在河南中原官話大概有兩條演變途徑：一是保存韻尾，像商丘、遂平、靈寶、盧氏；一是韻尾失落，像洛陽、開封、鄭州。帶韻尾的是較早的形式，不帶韻尾的是後起的形式。後來，不帶韻尾的形式影響了《中原音韻》北方官話的讀書音。

2.1節提到，曾梗攝在等韻音系的韻尾是舌面硬顎音-ŋ和-k̂。根據以上的討論以及表二的例字，入聲尾-k̂後來在中原官話和北方官話裏變成[-i]（即/-y/）韻尾，這個音變可用音變公式(2)表示。

音變公式(2) $k > y / V __$ （元音V後面的k̂變成y）

3.2. 德、陌、麥三韻的元音音變

從表四看出，在河南中原官話裏，德韻和陌麥韻字的韻核元音沒有什麼不同。再比較河北、山東等地的方言。按古入聲字的今調類，冀魯官話有兩個特點，即古清音入聲字今讀陰平，古次濁入聲字今讀去聲，前者與中原官話相同，後者與北京官話（北方官話）相同（李榮 1985，1989）。其實，除聲調外，從德、陌、麥三韻韻母的今讀，也能看出冀魯官話到底近於中原官話，還是近於北方官話。在山東省方言裏（見表五），有些地方如山東荷澤、莒縣，讀中元音[ə]或[e]。但有些方言，如山東聊城方言，讀低元音[a]（董紹克 1986）。讀低元音的屬於北方官話，讀中元音的屬於中原官話。其實，聊城方言是北方官話的一個特例。北方官話更普遍的現象是，德韻字通常是中元音，陌麥韻字通常是低元音。比較表五裏屬於北方官話的東北話和河北昌黎方言（中國語言研究所 1960）以及屬於中原官話的山東荷澤（董紹克 1986）、山東莒縣（石明遠 1987）、江蘇贛榆（劉斌 1990）三處方言。

	東北	河北昌黎	山東荷澤	山東莒縣	江蘇贛榆
德韻					
北	(墨)me	pei	pəi	pei	pei
得	(特)t'ei	tei	təi	tei	tei
勒	le	lei	ləi	lei	lei
賊	tsei	tsei	tsəi	tsei	tsei
刻	ke	k'ei	k'əi	k'ei	k'ei
塞	sei/sai	sei/sai	səi	sei	sei
陌麥韻					
白	pai	pai	pəi	pei	pei
麥	mai	mai	məi	mei	mei
擇	tsai	tsai	tɕəi	tɕei	tsei
責	tsai	tsai	tsəi	tɕei	tɕei
獲	xuai	**	**	xuei	**
額	ne	ŋɤ	əi	ŋai	ei

（**表示原材料未列此字）

表五 東北、河北、山東等地曾攝德、梗攝陌麥字韻核元音比較

看荷澤、莒縣、贛榆三處中原官話的讀音，其韻核元音都是中元音（莒縣有個別字念低元音，可能是古音的殘留）。再看屬於北方官話的河北昌黎方言和東北話，德韻字（曾攝一等）的韻核元音爲中元音，而陌麥韻的字（梗攝二等）爲低元音。德韻字和陌麥韻字今音韻核元音不同，這應是北方官話的一個特點，中原官話、冀魯官話（昌黎方言是個例外）和江淮官話都沒有這種現象。

表五說明，原曾攝與梗攝入聲字的元音，在北方官話和中原官話裏有不同的音變。先說梗、曾兩攝在唐宋時期的演變。在2.1節，我們把等韻時期的曾攝一等韻核元音定爲後低元音ɔ，梗攝二等的韻核爲央低元音a。據周祖謨先生研究，梗攝二三四等在宋代汴洛地區已通用不分（周 1943）。此外，宋代中原地區文人用韻顯示，梗曾攝合併。音變原理可以這樣解釋：在早期中原官話裏，梗曾攝元音先合併爲央元音a，這個a在具有前音特徵的入聲韻尾ŋ影響下，進一步前移爲前元音æ。

因此，當中原官話還保持入聲韻尾時，梗曾攝入聲字是-æŋ，而北方官話沒有合併，分別是-aŋ和ɔŋ。當入聲塞音尾消失後（音變公式(2)），中原官話變成-æy，北方官話變成-ay和-ɔy。中原官話的低元音又變成中元音，後來某些方言又失落韻尾-y。

北方官話梗曾攝入聲字的演變，有兩種現象。一是-ay和-ɔy合併，保持低元音，如山東聊城。二是梗攝保持低元音，而曾攝元音升高成爲中元音。對於曾攝元音升高，如果用「詞彙擴散」理論來解釋，北方官話跟中原官話一樣，梗曾攝合併後有些曾攝字受中原官話讀音的影響，改讀中元音了。這只能是個別字的現象，因爲曾攝字已經跟梗攝字合併了，音類上已經分不出彼此。原曾攝字受影響，原梗攝字也應受影響，如「額、格、客、革」。（但這些梗攝字都屬於二等喉牙音字，它們的音變是規則的。）

對北方官話曾攝元音升高，另一種解釋是，德韻字沒有跟陌麥韻字合併，曾攝德韻字保持-ɔy的形式，有別於陌麥韻-ay的形式。以後-ɔy元音升高，併入《中原音韻》的齊微韻（以高或中元音爲韻核）。在《中原音韻》裏，原德韻字大多出現在齊微韻（「則、刻」兩字在皆來韻，「塞」在支思韻），原陌麥韻的字都在皆來韻（以低元音爲韻核），沒有例外。所以，原德韻字和原陌麥韻字在《中原音韻》時代的主要差別是元音的高低。十四世紀北方官話德韻字和陌麥韻字的不同，就是元音高低的不同。

3.3. 中原官話與北方官話的歷史音變舉例

曾梗攝一、二等入聲字在中原官話（包括冀魯官話）具有相同的元音，而北方官話裏這兩類字有不同的元音。此外，3.1節音變公式(2)表示曾梗攝入聲尾在中原官話和北方官話的變化。要具體排列某些字音從中古到現代的整個演變過程，有關音變還有兩條。

(1) 曾梗攝合併，其音變原理是曾攝一等的後元音 $\circ$ 和梗攝二、三等的央元音 a ，在具有前音特徵的韻尾 $-ŋ$ 或 $-k$ 的影響下前移為前元音 æ 。此處暫以音變公式(3)表示。⁶

$$\text{音變公式(3)} \quad \left\{ \begin{array}{c} \circ \\ a \end{array} \right\} > \text{æ} / _ \left\{ \begin{array}{c} \hat{k} \\ \text{ŋ} \end{array} \right\}$$

(2) 二等開口喉牙音字讀為細音，即喉牙音二等字韻核元音 a 前面滋生了一個 $-y$ （ $[-i-]$ ）介音，這用音變公式(4)表示。

$$\text{音變公式(4)} \quad \emptyset > y / G _ a \quad (G \text{代表喉牙音聲母})$$

薛鳳生先生認為，這三條音變，即公式(2)、(3)、(4)，在中原官話和北方官話發生的順序不同。中原官話的順序是(3)—(4)—(2)，北方官話的順序是(4)—(2)—(3)（薛 1992）。現將德、陌、麥三韻的例字及有關喉牙音字的韻母在中原官話的歷史演變過程，列於表六。

	得 -ɔk	賊 -ɔk	白 -ak	麥 -ak	宅 -ak	耕 -aŋ	江 -aŋ
(3) $\left\{ \begin{array}{c} \circ \\ a \end{array} \right\} > \text{æ} / _ \left\{ \begin{array}{c} \hat{k} \\ \text{ŋ} \end{array} \right\}$	-æk	-æk	-æk	-æk	-æk	-æŋ	---
(4) $\emptyset > y / G _ a$	---	---	---	---	---	---	-yaŋ
(2) $\hat{k} > y / V _$	-æy	-æy	-æy	-æy	-æy	---	---
						(-æŋ)	
						(-iŋ)	

（注：例字下的標音為等韻時期的韻母形式，演變過程自上而下。）

表六 中原官話裏德、陌、麥三韻及有關喉牙音字的歷史演變過程

⁶ 關於公式(3)的討論，見薛鳳生 (1985, 1982)。他用 $/e/$ 表示前低元音，本文改用 $/\text{æ}/$ ，以區別於現代方言記音常用的中元音 $[e]$ 。

如再加上中原官話裏-y韻尾的兩種變化途徑(3.1)，我們就得到原德、陌、麥三韻在現代中原官話的兩種讀音，即靈寶、盧氏的[ei]音，洛陽、開封、鄭州的[æ]音或[ɛ]音。

從表五的昌黎方言裏，我們發現德韻字在北方官話裏有不同於陌麥韻字的元音。北方官話的德韻字並沒像中原官話那樣隨陌麥韻字一起變化（公式(3)），而是保持了後低元音。所以，公式(3)在北方官話不包括曾攝字。它們後來元音升高，隨其他蟹攝字一起歸入齊微韻。而原陌麥韻的字此時已入皆來韻，這就造成德、陌麥這兩類字在現代北方官話裏不同元音的結果。

上文提到的三條音變在北方官話發生的先後順序是(4)—(2)—(3)。根據以上分析，再加上尾音公式(2)在元音公式(3)之前發生，公式(3)在北方官話裏有兩點不同於中原官話：一是不包括曾攝元音ɔ，⁷ 二是不包括入聲韻，只代表梗攝舒聲韻的音變（入聲字已變入蟹攝字）。公式(3)在北方官話裏應改寫為公式(3')。

音變公式(3') $a > \text{æ} / _ \text{ɲ}$

根據音變公式(4)、(2)、(3')這三條音變，再加上蟹攝字的元音升高，原德、陌、麥韻例字及有關喉牙音字在北方官話的歷史演變過程，列於表七。

	得 -ɔk	賊 -ɔk	白 -ak	麥 -ak	宅 -ak	耕 -aŋ	江 -aŋ
(4) $\text{ɔ} > \text{y} / \text{G} _ \text{a}$	---	---	---	---	---	-yaŋ	-yaŋ
(2) $\text{k} > \text{y} / \text{V} _$	-ɔy	-ɔy	-ay	-ay	-ay	---	---
(3') $\text{a} > \text{æ} / _ \text{ɲ}$	---	---	---	---	---	-yæŋ (-yæŋ)	---
$\left\{ \begin{matrix} \text{ɔ} \\ \text{æ} \end{matrix} \right\} > \text{i} / _ \text{y}^8$	-iy	-iy	---	---	---	--- (-yiŋ)	---

表七 北方官話裏德、陌、麥三韻及有關喉牙音字的歷史演變過程

⁷ 從薛鳳生先生對「黑」字（代表「北」「得」「賊」「國」等字）讀音的排列看，曾攝一等字的音變在這兩個官話裏沒有什麼差異，都保持低後元音ɔ。所以他的公式(3)反映不出北方官話德韻與陌麥韻的元音不同。

⁸ 現代北京話的「得」「賊」等字的韻腹元音舌位較高，可用/i/或/ɔ/表示。本文用/i/，理由見薛鳳生（1986: 20-1）。

表六和表七的不同音變順序，說明中原官話和北方官話的不同演變過程。先看二等喉牙音「耕」字的讀音（包括同類的「更（「三更」）、粳、耿」）。表六的中原官話念[kəŋ] (/kiŋ/)，表七的北方官話念[tɕiŋ] (/kyiŋ/)，它們的主要不同在於-y-介音的有無。在北方官話的演變中，-y-介音的滋生發生在梗攝二、三、四等合併之前，所以二等「耕」字獲得了介音。在中原官話的演變中，因為曾梗攝元音先起變化，所以-y-介音就沒在元音前滋生（但仍在宕江攝發生，像「江」字）。北方官話和中原官話對於「耕」字（包括「更、粳、耿」）的不同讀法，反映開口二等喉牙音字變細音的先後次序及範圍在這兩個官話裏都是不同的。

再看音變公式(2)的地位。在中原官話裏，它肯定發生在梗攝各等合併之後。據周祖謨先生研究，梗攝庚、耕、清、青四韻宋代中原地區文人大都通用不分（周 1943），音變(2)所代表的入聲消失肯定發生在這以後。但是，在北方官話裏，它卻必須發生在梗攝各等合併之前。否則，現代北京話的「白」「麥」「宅」等不會念低央元音[a]。它們會在入聲尾變化後，隨蟹攝字升高元音，念成與「賊」「得」的韻母相同。

4. 「方言混合假說」與「詞彙擴散理論」

4.1. 「方言混合」與文白讀音

所謂方言混合 (dialect mixture)，指方言間的相互影響，由社會、政治、人口遷移等因素造成的一方言對另一方言的影響。自從19世紀下半葉新語法學派 (Neogrammarian) 提出語音規律無例外的口號以後，「方言混合」被用於解釋由借詞而引起的不規則語音現象。

治漢語方言的學者也常常使用方言混合這個概念，如北京話裏「尷尬」的「尬」[ka]音，在極少的幾個[ka]音節裏唯一念去聲，它明顯是個外來音。然而，按照徐通鏘先生對文白讀音的定義，我們曾把官話方言裏通常說的文讀音也算作一種外來音，如本文1.1節所說的德、陌、麥三韻的文讀音。所以，就北京話而言，存在著兩種意義上的外來音。一種是把北京話看作一個內部一致的音系，「尷尬」之類是這個音系以外的借音。李榮先生所講的北京話的白讀音，

大概指這種讀音。一種是把所謂內部一致的音系再分類。根據一字文白兩讀的現象，指出其中的一個來源於較早時期外方言的影響。這種影響通常不是個別的，而是音系的。不然，為何一組古音上有淵源關係的字都有相同的讀音（如表二裏宕江攝的字）？至於方言影響的過程，可以假設成兩個階段：引進階段和融合階段。一開始，外來音作為一種特殊語體，在一定範圍內流行。在官話方言裏，這種外來音並非照搬外方言的整個音系，而是引進外方言音系最具代表性的讀音，如入聲字的讀法。在非官話方言裏，官話音的影響是整個音系的影響。例如，在絕大多數閩方言裏，文讀音有一套自己的聲韻調系統（陳章太、李如龍 1991：131-4）。隨著影響的擴大，在官話方言裏，外來音逐漸被本地音吸收，有的甚至取代了當地的讀法，這可以稱作方言的融合階段。所謂外來音取代本地音，指一些字的讀音，依歷史來源不符合當地音變規律，例如表二中「責」「獲」等字的北京話的讀法。它們現在只念零韻尾，而不念[-i]韻尾，可能因為零韻尾的讀音被借入後，取代了原有[-i]韻尾的讀音。前面提到的音系的融合，就是指這個替代過程。如果有一個獨立於口語音系之外的文讀音系，那麼本地音、外地音各自獨立，⁹ 就很難說有什麼音系融合了。

以上說明方言混合的兩個階段並非發生在所有漢語方言裏。在官話方言區，由於方言間的接觸頻繁，常有音系融合發生。但在非官話區內，如閩方言，外來音僅作為不同語體存在，並沒有融入當地口語音系，所以方言混合僅停留在引進階段。

在北方官話裏，方言混合常常是多層次的，也就是說一方言受到多個外方言的影響。Hugh Stimson 根據中古入聲字在北京話今讀聲調與韻尾的不同，提出北京話入聲字的讀音來自四個族系 (strain)，以此支持 R.A.D.Forrest 關於方言借用引起北京話入聲分化的觀點 (Stimson 1962)。本文在1.1節提出，北京話宕江攝入聲字的文讀音與中原官話有關，而曾梗攝入聲字的文讀音與江淮官話有關。這是就它們最初來源而言，不能說中原官話影響北方官話時，只對宕江攝入聲字發生作用，而沒碰曾梗攝的字。本文3.1節提出中原官話曾梗攝入聲噫韻尾有兩條演變途徑，其中韻尾消失的音變，也可能是受了江淮官話的影響。江淮官話曾梗攝喉塞音韻尾的形式，先進入中原官話的文讀音，進而融合於口語音，然後再影響北方官話。從《中原音韻》看，對北方官話的影響肯定發生在

⁹ 文言詞、口語詞應屬於不同系統，這樣，文言詞的讀音就不能算作本地音。

14世紀之前，因為原屬梗攝的「客」「嚇」「額」三字，既出現在《中原音韻》收噫韻尾的皆來韻裏，又出現在收零韻尾的車遮韻裏。元朝大都地區還不普及的零韻尾文讀音，大概來自遼金時期中原地區的標準語對幽燕地區的影響。¹⁰ 此後，明代的遷都、移民以及《洪武正韻》的推行，都會對北京話的文讀音產生影響。

總而言之，新語法學派認為，音變都應是有規律的，方言混合是造成語音不規則的原因之一。在這個理論下，有淵源關係的字，在同一方言裏都遵循同一條語音規律而變化。如有不合規律的，則是方言融合，由外來音取代了本地音。

4.2. 「詞彙擴散」與文白讀音

王士元先生1969年的詞彙擴散理論著眼於音變在詞彙中的擴散，認為在擴散過程中顯示音變的參差、中斷和音變的殘存。潮州方言裏原濁聲母去聲字今讀陽上、陽去比例十分接近的現象，被看作音變在詞彙擴散中進行了一半的最好例證 (Cheng & Wang 1972)。

詞彙擴散理論受到不少中國音韻學者的批評，主要有丁邦新 (1978)，Marjorie Chan (1983)，徐通鏘 (1991)。丁邦新先生不同意詞彙擴散論者把屬於不同系統的文白讀音（潮州話的濁去分化）揉合一起，用來推論語音演變的路向。Marjorie Chan 認為漢語方言裏未完成的音變，都能用方言影響來解釋，所以詞彙擴散論不能代替方言混合論來解釋一切不規則現象。參考這些意見後，詞彙擴散論的最新版本 (Wang & Lien 1993) 繪製了一幅「詞彙擴散」與「方言混合」和平共處的新藍圖。這個最新版本（以下簡稱「新論」）提出方言混合分為兩個階段，起始階段 (actuation) 與實施階段 (implementation)。在起始階段，「詞彙擴散」確有發生。在實施階段，一旦兩種音系的相互依賴關係 (symbiotic relationship) 建立，並且合成共存系統 (coexisting systems)，語音變化在這共存系統裏呈雙向擴散 (bidirectional diffusion) (Wang & Lien 1993: 345-56)。新論還一改舊版的語言等質 (homogeneous) 的看法，主張語言是異質的

¹⁰ 此時中原地區的標準語應為相對於口語音的文讀音。根據本文音變公式(2) (見3.1)，中原官話口語音裏，曾梗攝入聲字也變成收噫尾。至於宋遼時期汴洛地區的文白讀音系統以及南方金陵官話如何影響中原地區，因材料缺乏，暫不討論。

(heterogeneous)。因此，由方言混合而引起的所謂系統外部變化，在共存系統裏就沒有區分的必要 (Wang & Lien 1993: 355-6)。下面是新論對於潮州話古濁去今讀分化的新構想。

在方言混合的起始階段，文言音與白話音互不影響，保持各自的語音系統，例如，文、白層次都有陰上調類，但調值一定有異。在方言混合的實施階段，由八個白話音聲調和七個文言音聲調（濁上變去），合併成現代潮州話的八個聲調。例如，現代的陽上，包括原文言音的陽去（包括已變化的全濁上）和原白話音的陽上；現代的陰上，包括原白話音的陰上和原文言音的次濁上；現代的陽去仍為原白話音的陽去。語音變化在現代音的陽上字和陽去字之間呈雙向擴散，這就是說，在陽上字中間融入了原屬白話音的字，在陽去字中間融入了原屬文言音的聲母或韻母成分（見Wang & Lien 1993: 362-75）。

從以上說明看出，新論的新意在於以語言異質性為出發點，理直氣壯的把文白讀音揉合在一起，以推測語言變化的方向。儘管新論口口聲稱，文、白讀音層次在現代漢語方言不再被區別，但在分析步驟上寸步離不開它們。本文論證了官話方言的文白異讀來自歷史上外來音的影響，這與詞彙擴散新論在方言混合過程中區分文、白語音層次是一致的。此外，我們把方言影響分為引進階段與融合階段，這也與新論關於方言混合的兩個階段是一致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認為融合只發生在官話方言，而沒有在閩語這類非官話方言裏發生。新論則根據語言的異質性，認為融合發生在所有漢語方言。

4.3. 餘論

既然詞彙擴散新論已接受方言混合的說法，就沒有必要再分辨官話方言裏原入聲字讀音不規則現象，到底是方言影響的結果，還是「詞彙擴散」的殘餘。兩種假說的不同是，第一，當外來音進入本地音系，方言混合假說主張外來音通過詞彙的借用而最終取代一些字的本地讀音，詞彙擴散則認為外來音中止本地方言原有的某些音變。第二，在處理現代方言的文白讀音上，方言混合假說求分，詞彙擴散新論求合。

就官話方言而論，我們可以找到歷史上外來音對本地音的影響或滲透，卻不存在一個獨立於口語音之外的文讀音系。例如，在屬於江淮官話的江蘇北部沭陽方言裏，原曾梗攝入聲字收零韻尾，但有兩個字例外。「賊」念[tse]，入聲

調；或者念[tsei]，陽平調。「塞」念[tɕə]，入聲調；或者念[sə]，陰平調。念入聲的屬本地音系，念舒聲的是外來音。¹¹ 這兩個外來音融入沭陽本地音系後，並不用於文讀。「賊」的[tsei]音只用於口語音，讀書音用[tɕə]，如在「賣國賊」和「林賊」這兩個詞裏念入聲。「塞」的兩個讀音則有語法上的分別，念舒聲的是動詞，念入聲的常用作名詞（侍建國 1994a：145-7）。其實，在官話方言研究上，某些字的外來音在被當地音系吸收時，是取代了當地的某個原讀音，還是中止了當地音的某個音變，這並不重要。能分清楚那些外來音的來龍去脈，就相當不容易了。

（本文於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二十日通過刊登）

¹¹ 在沭陽方言的歷史演變過程中，韻母ay變成æ。詳見侍建國（1994a: 112-6）。

引用書目

丁邦新

- 1978 A note on tone change in the Ch'ao-chou dialect,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50: 257-271.

丁聲樹

- 1989 〈河南省遂平方言記略〉，《方言》1989.2。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 1960 《昌黎方言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石明遠

- 1987 〈山東莒縣方言音系〉，《方言》1987.3。

李榮

- 1956 《切韻音系》，北京：科學出版社。
1982 《音韻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5 〈官話方言的分區〉，《方言》1985.1。
1989 〈漢語方言的分區〉，《方言》1989.4。

周世箴 (Chou, Shizhen)

- 1986 〈論《切韻指掌圖》中的入聲〉，《語言研究》1986.2。
1989 Hongwu Zhengyun: Its Relation to the Nanjing Dialect and its Impact on Standard Mandarin. Ph.D.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河北人民出版社

- 1961 《河北方言概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侍建國

- 1994a The Shuyang Dialect: A Study in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Ph.D.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4b 〈宋代北方官話與邵雍「天聲地音」圖〉，第三屆漢語語言學國際會議論文（香港，1994年7月14日至16日）。
1996 〈官話德、陌、麥三韻入聲字音變〉，《方言》1996.3。

周祖謨

- 1943 〈宋代汴洛語音考〉，《問學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66。

邵榮芬

- 1982 《切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林燾

- 1987 〈北京官話區的劃分〉，《方言》1987.3。

俞敏

- 1986 〈現代北京話和元大都話〉，日本《中國語學》1986年10月。又載《俞敏語言學論文二集》，1992年。

侯精一

- 1986 〈晉語的區分（稿）〉，《方言》1986.4。

高本漢

- 1948 《中國音韻學研究》（中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徐通鏘

- 1991 《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陳章太、李如龍

- 1991 《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董同龢

- 1968 《漢語音韻學》，台北：廣文書局。

董紹克

- 1986 〈山東陽谷梁山兩縣方言的歸屬〉，《方言》1986.1。

賀巍

- 1985 〈河南省西南部方言的語音異同〉，《方言》1985.2。

- 1993 《洛陽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劉斌

- 1990 〈贛榆（劉溝）方言同音字彙〉，《方言》1990.1。

鮑明燁

- 1986 〈南京方言歷史演變初探〉，《語言研究集刊》第一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錢曾怡 高文達 張志靜

- 1985 〈山東方言的區分〉，《方言》1985.4。

薛鳳生

- 1978 〈論入聲字演化規律〉，《屈萬里先生七秩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社。

- 1982 〈論音變與音位結構的關係〉，《語言研究》1982.2。

- 1985 〈試論等韻學之原理與內外轉之含義〉，《語言研究》1985.1。

- 1986 《北京音系解析》，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1987 The languages of the sages and the poets: Some aspects of the Chinese linguistic tradition, Inaugural Lectures 1986-1987. College of Humanitie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p. 29-35.

- 1990 《中原音韻音位系統》（中譯本），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侍建國

薛鳳生

- 1992 On dialectal overlapping as a cause for the literary/colloquial contrast in standard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no.1, Symposium Serie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Taiwan), no.2, pp. 379-405.

Chan, Marjorie K.M. (陳洁雯)

- 1983 Lexical diffusion and two Chinese case studies re-analyzed, *Acta Orientalia* 44:118-152.

Cheng, Chin-Chuan and Wang, William S-Y. (鄭錦全、王士元)

- 1972 Tone change in Chaozhou Chinese: a study of lexical diffusion, In Kachru, Braj B. et al.(eds) *Paper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Henry and Renee Kahane*.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p. 99-113. (Reprinted in Wang 1977:148-158)

Hashimoto, Mantaro J. (橋本萬太郎)

- 1978-1979 *Phon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 Africa, Monograph Series 10.1(1978), 10.2(1979), Tokyo, Japan.

Norman, Jerry (羅杰瑞)

-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lleyblank, E.G. (蒲立本)

- 1984 *Middle Chinese: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Vancouver: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Stimson, Hugh M.

- 1962 Ancient Chinese -p, -t, -k endings in the Peking dialect, *Language* 38: 376-384.

Wang, William S-Y. (王士元) (ed.)

- 1977 *The Lexicon in Phonological Change*. The Hague: Mouton.

Wang, William S-Y. and Lien, Chinfa (王士元、連金發)

- 1993 Bidirectional diffusion in sound change, In Jones, Charles (e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New York: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pp. 345-400.

Regionalism to and Diachronic Changes of the Mandarin Phonology

Jianguo Sh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t is assumed, in the diachronic study of the Mandarin phonology, that there are three versions of Mandarin: Northern Mandarin (eg. the Beijing dialect), Central Mandarin (eg. the Kaifeng dialect) and Southern Mandarin (eg. the Yangzhou dialect). In this paper, two pieces of supportive evidence are provided regarding sound changes in the previous entering-tone syllables. One comes from the changes of stop endings, such as [-k] of *jiang-dang* rhyme groups lost in both Central Mandarin and Southern Mandarin, while it has become [-u] in Northern Mandarin; [-ŋ] of *geng-zeng* rhyme groups lost in Southern Mandarin, whereas it changed to [-i] in both Northern Mandarin and Central Mandarin. The other evidence is of the vowel height in entering-tone syllables from the *geng-zeng* groups, of which the syllable nuclei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grades merged to one mid vowel in both Central Mandarin and Southern Mandarin. In Northern Mandarin, however, the nucleus of the second grade changed to a low vowel. Finally, sound change theories concerning "dialect mixture" and "lexical diffusion" are revalued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Keywords: Mandarin phonology, diachronic sound changes, Northern Mandarin, Central Mandarin, Southern Mandarin